

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

张颖

摘要: 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与西方的结盟外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以主权平等为基础,以首脑互访为手段,以反对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为动力,以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时提出的“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为依据,为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奠定了基础。“伙伴外交”成为中国利用外部战略资源的重要手段,成为中国外交资源的“生长点”。本文通过考察“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的缘起与实践,对新时期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提出了新的建议。

关键词: 中国外交; 非洲阿拉伯国家; 伙伴外交; 新型伙伴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

作者简介: 张颖,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9)05-0034-07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伙伴外交”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尼日利亚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从1955年万隆会议新中国领导人同非洲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握手,到2005年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中国和亚非国家共同推动建立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从中国帮助非洲培训争取民族解放的‘自由战士’,到非洲国家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中非建设者们共同奋战在热带丛林、用血汗筑就坦赞铁路,到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历史见证了中非友好的一座座里程碑。中非关系50年的发展进程历历在目,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1]回眸新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交往50多年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非洲阿拉伯国家高度重视,他们亲自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为推进双方的友好关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为当前“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伙伴外交”的源起

“伙伴外交”不同于西方的结盟外交,前者强调主权平等,后者强调霸权稳定;前者强调结伴而不结盟,后者强调缔结军事盟约。非洲是中国开展“伙伴外交”的重点地区,是中国外交资源的重要来源。^[2]西方殖民体系于20世纪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崩溃瓦解,1959~1964年,世界上涌现出30多个新的民族独立国家,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1963年12月~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①等10个非洲国家。这是新中国领导

^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1958年2月1日由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组成的国家,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因政变宣布退出,但埃及仍沿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名至1972年为止。

人第一次访非，是当时中国外交的一次战略行动，也是“伙伴外交”的试验场。

周恩来访问的 10 个非洲国家包括北非 4 国：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西非 3 国：加纳、马里和几内亚；东非 3 国：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10 个国家包括 6 个阿拉伯国家和 4 个黑非洲国家，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或有伊斯兰背景的国家。周恩来指出，此次出访的目的“是寻求友谊与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3]，是为打破美苏对我国的孤立，大力支持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发展反对美苏两霸的统一战线，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北非阿拉伯国家是连接亚非两大洲的纽带。周恩来首先出访北非的阿联，阿联是非洲最早宣布独立的国家之一。一踏上非洲的土地，周恩来就表示：“我们不是来得太早了，而是来得太晚了。这次来了，开了端，以后就会经常地到非洲来。我们亚非国家，根据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是应当经常彼此来往的。”^[3]关于中非交往的原则，周恩来向阿联朋友表示：“第一个办法是求同存异”，“第二个办法是不要帝国主义插手，由亚非国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3]在与阿联总统纳赛尔的会谈中，中方提出了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得到纳赛尔的高度赞赏，并写进了两国的联合公报。几天后，中国与阿尔及利亚的联合公报再次写进了这五项原则，即“（1）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非洲各国以和平方法解决相互之间的争端；（4）支持非洲各国人民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5）主张尊重非洲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任何外来的侵犯和干涉。”^[3]周恩来表示：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五项政策，主要一点是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不搞颠覆活动，平等友好相处。周恩来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不断宣传这五项原则，并得到各国的普遍支持。

周恩来出访亚非各国，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空前的盛举，新中国也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在周恩来访问期间，中国和突尼斯宣布建交；同埃塞俄比亚虽未发展至建交，但达成了发展正常关系的协议。周恩来后来总结说：这次访问“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同亚非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宣布和阐明了我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得到了阿拉伯国家和黑非洲国家的赞同；突破了美国的阻挠，同突尼斯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埃塞俄比亚达成了在最近的将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进一步了解了非洲人民关于加强非洲团结和促进非洲统一的要求，支持非洲国家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斗争中的联合行动，支持非洲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愿望。”^{[5]396-402}

在结束对亚非各国的访问后，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全体会议联席会议上作的《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中说：“同亚非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友好坦率的会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创造了同他们接触的许多新的经验。发表了一系列有助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联合公报。”周恩来表示，对非洲的访问，“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去做探路的工作，但是，这个探路的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政府的、民间的、从各方面去的人打开一个关系。”^{[5]396-402}

在周恩来访问亚非各国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先后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建交。1965 年陈毅访问西亚非洲 6 国，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更是不断到中国进行访问。频繁的交往加深了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间的友谊，中国的“伙伴外交”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二、“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与“伙伴外交”的完善

20 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非洲阿拉伯国家在政治

和经济上迫切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这为中国开展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提供了机遇。毛泽东和周恩来坚决支持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以及建设国家的努力，并在财力和物力等方面予以无私帮助，得益于老一辈革命家的运筹帷幄，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之间才结成“患难之交”和“全天候朋友”。

中国在政治上坚决支持非洲阿拉伯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阿拉伯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并视其为与争取民族解放同样重要的事业，这是五项原则的核心内容。毛泽东一再以最鲜明的态度向非洲阿拉伯朋友表示：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并且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强调：“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4]526}

“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5]387}是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国际关系方面提出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毛泽东在接见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朋友时反复强调：“我们是朋友，互相帮助，互相支持，我们是平等的。现在我们在一起，并不感到有什么隔阂，我们同你们一般高，不是一个高一个低，我们是平等的，我们和你们没有利害冲突，只有团结友好。”^{[4]401}毛泽东向非洲阿拉伯国家朋友表示：“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4]537}周恩来指出：“这是国家之间新的关系，而不是过去殖民国家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关系”，“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很大，特别是道义上的支持更大”，“我们感到你们特别应受尊重。为什么？因为你们过去最被人歧视，现在特别应受到尊重。”“我们特别支持你们为提高黑人的地位和非洲的地位斗争。我们在过去也受到同你们一样的歧视，因此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支持你们。”他表示：“世界上有人说，我们只同贫穷的小国作朋友。这正是中国的特点。”“我们最高兴与贫穷小国交朋友。世界上小国有一百三四十个，是多数；大国有几个？大国要垄断一切是不可能的。”“真正的朋友要从穷朋友当中去找。”周恩来在出访非洲时还表示：我们亚非国家的相互援助，是穷朋友的同舟共济，而绝不是大凌小、强欺弱。这种相互援助，是可靠的，平等互利的，切合实际的，真正有助于亚非各国独立发展的。^[6]中国的友好姿态也换来了非洲阿拉伯朋友的真诚回报，卡翁达就曾表示：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朋友，而中国人在我们最好的朋友之列。

反对殖民主义是中国开展“伙伴外交”的动力。毛泽东、周恩来特别强调非洲阿拉伯国家团结的重要性，支持非洲阿拉伯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相互间的争端。毛泽东表示：“已经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有责任对那些正在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英勇斗争的非洲各国人民给予各种方式的援助。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4]404}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4]404}1958年4月，非洲举行独立国家会议，这在非洲历史上是第一次自己举行全洲性的会议。对于非洲的团结与统一，周恩来指出：“非洲觉醒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一基础上，非洲统一或团结的趋势是肯定的，至于采取什么具体形式来加强团结，那要由非洲人民自己决定。”

“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而不是其他洲的人的非洲。”^{[5]396-402}1963年5月22~2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会议所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宪法》宣布，其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统一和团结，加强非洲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合作，保卫和巩固非洲国家的独立以及主权与领土完整，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

殖民主义，促进国际合作。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非洲阿拉伯国家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纠纷与矛盾，周恩来在访问亚非各国时向各国表明中国的“不介入”原则。周恩来劝告非洲阿拉伯朋友，非洲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矛盾时，“民族独立、非洲团结、统一是第一，你们兄弟国家之间的争端，包括民族和边界的争端，要坚决通过谈判解决而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5]327-328} 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周恩来表示：“我们一向坚持万隆精神，主张任何争端和平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我们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在争端中支持任何一方。”“我们对争执问题本身的情况不了解，提不出意见；但我们可以呼吁双方和平解决。我们自己只能采取不介入的立场。”“我们的不介入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不会站在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在索马里，周恩来在记者召开会上表示：中国对非洲国家之间的争端，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而呼吁有关国家和平解决争端。^[7]中国的“不介入”原则迥异于西方对非洲事务的任意干涉，经过不断的宣传和解释，非洲阿拉伯国家普遍理解了中国的“不介入”原则。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始终强调，支持非洲阿拉伯国家人民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恪守“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针对一些非洲阿拉伯国家十分推崇中国式革命道路，毛泽东指出：“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4]370} 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建设经验对非洲有参考价值，但仅限于参考价值，不能照抄。非洲各国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情况，有各自的特点，取得独立后如何建设，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摸索达到，这是最宝贵的。我们友好国家只能从旁帮助。”“非洲现在正在寻求真理，倾向社会主义，这很自然。但是，从非洲今天的历史任务来看，是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阶段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在获得独立以后，并不一定都选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的制度是要由人民来选择的。”“在非洲还是多强调民族独立、民主改革更适合于非洲的形势，不宜太多的强调社会主义，多强调了会造成敌人过早的恐惧。”^{[5]396-402} 在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断强调，虽然各国都有不同具体情况，不会一样，实际上有的快些，有的慢些，但这一点可逐步实现。各国国内制度应该根据人民自己的选择，别国不得干涉。

对于非洲阿拉伯国家普遍赞同的不结盟政策，中国表示支持。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由于新独立国家在非洲的大批出现，民族主义国家数量大为增加并已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在它们中间，和平中立倾向逐渐发展成为“不结盟运动”，亦即既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集团结盟，也不同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结盟。1961年9月，有25国参加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其中包括11个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刚果、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索马里、苏丹、突尼斯、阿联。中国当时是结盟国家，但仍对非洲国家参加不结盟运动表示理解和支持。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举行前夕，周恩来致电表示祝贺，祝愿会议“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贡献”。^①从此以后，中国领导人对每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都表示祝贺，并对其反帝、反殖和反霸的基本立场表示支持。

可见，在与非洲阿拉伯国家交往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反对任何外来侵略和干涉，同时尊重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尊重各国人民和政府对本国制度和内外政策的选择，坚持绝不介入他国内政的基本立场，尤其反对在非洲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表示：“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

^①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于1964年10月在开罗举行，第三次于1970年9月在卢萨卡举行，第四次于1973年9月在阿尔及尔举行。

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4]491} 周恩来也对非洲朋友表示：“你们独立后，如果我们能建交，我们派了大使、代表团或者一些专家去帮助你们建设，要是他们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欺侮你们、控制你们，你们就把我们赶出去，这样才算作平等。中国是个大国，是不是有大国沙文主义呀，这问题我们一直是注意经常教育我们干部的。你发现有这方面的表现，请告诉我们。根据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仅要教育我们的干部，还要教育我们的后代。”^{[5]396-402}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是中非交往的政治基础，它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得到了非洲各国的赞同。中国在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尊重同时也赢得了非洲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尊重，这成为中国在非洲阿拉伯国家享有崇高威信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伙伴外交”的绩效

新中国提出“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并开展“伙伴外交”，加强了同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交往，特别是加强了同既属于阿拉伯国家又属于非洲国家的北部非洲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交往，成为中阿相互支持的动力。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阿联、叙利亚和约旦发动突然的军事袭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8] 战争爆发后，美英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表示支持。前苏联也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阿联撤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要求和对亚喀巴湾的封锁。就在阿拉伯人民无法从其他大国得到任何道义上的支持时，中国政府则明确表示了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立场。以色列发动战争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以对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揭露苏联纵容美以侵略，表示中国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周恩来还致电纳赛尔，表示中国永远做阿拉伯人民忠实可靠的战友。这次战争之后，苏联乘埃及抵抗美以侵略急需外援之际，积极渗入埃及。1971年5月，苏联与埃及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加紧对埃及的控制和干涉。对此，埃及不断进行斗争。1972年7月，埃及总统萨达特下令驱逐在埃及的近2万名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1973年7月，萨达特公开点名谴责苏联出卖埃及人民的利益。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前夕，苏联从埃及撤退专家。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埃及不仅减少军火，还停止经援。对于埃及为反对苏联控制和干涉所进行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给予公开支持，并及时向埃及人民提供了相应的援助。

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真诚交往得到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认可。非洲阿拉伯国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未能得到承认，从1951年到1960年，每届联合国大会都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但美国每次都提议“延期讨论”而加以否决。1961年后，美国又提出“重要问题案”须2/3多数才能通过，以阻止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65年，由于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增加，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骤变，加之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在大会表决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它为中国惟一合法的代表”的提案时，出现了47票赞成、47票反对、20票弃权的局面，第一次出现了赞成票同反对票持平的局面。上述支持中国的提案由12国提出，其中非洲国家占一半。此后，为了能通过两阿提案，各提案国内部加强了策略等方面的协调，力争在总务委员会通过先讨论两阿提案，后讨论“双重代表权案”，这样既可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又可使非洲国家提案获得通过时，使美日等19国包含“两个中国”内容的“双重代表权案”成为废案。在非洲国家的努力下，两阿提案从1965年的12国扩至1971年第26届联大召开前的18国，最后到23国。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前的辩论中，非洲很多国家批评和谴责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指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联合国就丧失了普遍性；现在是联合国改正这一历史性错误的时刻”；强调“美国无视客观事实，无视伟大中国的存在，制造‘两个中国’违背历史潮流”。他们发言用语之尖锐，论据之充分，矛头所向之明确，为联合国历届大会一般辩论所少见。一位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加拿大记者感叹道：“这种辩论表明，非洲等许多国家站在红色中国一边，后者能赢得如此的支持，使我十分震惊”。当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重要问题决议案”被否决时，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非洲阿拉伯国家与其他非洲国家常驻代表一起情不自禁地从代表席上站立起来，高声欢呼胜利。大会随后表决通过两阿提案，当宣布这一提案通过时，会议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一些非洲国家代表欢呼雀跃，热烈庆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三大电视台当晚以特大要闻插播方式广播了这一消息，称“在非洲等 76 个国家的支持下，红色中国获准进入了联合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翌日早晨，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日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时报》等以“非洲国家支持红色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获得通过”、“非洲国家同红色中国站在一起”的通栏标题报道了此消息，并都刊登了投票赞成联大第 2758 号决议的 76 个国家的名单，其中非洲国家 26 个，占了 1/3 以上。闻知这一消息，毛泽东动情地说，这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四、“伙伴外交”对当前中非与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意义

2009 年 6 月 11 日，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和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共同主持召开“中非合作论坛”第 4 届部长级会议中方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暨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全面启动和部署了论坛第 4 届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工作。^[9]2009 年 6 月 23 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中阿合作论坛”第 6 次高官会阿方代表团团长，指出当前中阿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推动建设面向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中阿新型伙伴关系是双方共同的战略选择。“中阿合作论坛”成立 5 年多来，在深化中阿传统友谊，推进双方互利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0]

中国提出的“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第一次完整地概括了新中国对中东及阿拉伯国家政策的全部内容，为新中国对以上地区的政策提供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政策指南，确立了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基本政策；“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阿拉伯及非洲地区的具体运用；同时，“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的创造性提出，又为世界各国与中东及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平等交往提供了一个政策性的范例；从实践上看，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促进了同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交往，进而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大大拓展了中国的国际空间，使中国初步摆脱了受美苏孤立的被动局面，树立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伙伴外交”确立了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基本政策，奠定了世代友好的基础。

“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后，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关系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伙伴外交”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中国和非洲阿拉伯国家具有相似的国情，并面临着相似的改革与发展任务，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战略利益。当历史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加清晰的时候，当新中国走过了 60 年的风雨历程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世界大国的时候，当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时候，回首当年，人们无法忘记老一辈革命家提出并实践“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

五项原则”的丰功伟绩；展望未来，“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的精神内涵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新中国与非洲真情合作 50 年[N]. 人民日报, 2006-04-28.
- [2] Joshua Eisenman Eric Heginbotham, and Derek Mitchell.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M].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England: M.E. Sharpe, 2007.
- [3] 周恩来答记者问[N]. 人民日报, 1963-12-22.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 [6] 周恩来总理对马里电台记者发表讲话[N]. 人民日报, 1964-01-22.
- [7] 周恩来总理在摩加迪沙举行记者招待会[N]. 人民日报, 1964-02-06.
- [8] David W. Lesch.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Reassessment[M]. Cambridge, MA: Westview, 2003.
- [9]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筹备工作全面启动[EB/OL]. [2009-06-29].
http://news.cqnews.net/gn/wjfy/200906/t20090626_3375864.htm.
- [10] 戴秉国会见中阿合作论坛第六次高官会阿方代表团团长[EB/OL]. [2009-07-12].
http://news.cqnews.net/gn/wjfy/200906/t20090626_3375864.htm.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to Arab Countries in Africa

ZHANG Ying

Abstract China's "Partnership diplomacy" is categorical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alliance diplomacy. The former is on the basis of sovereignty equality with the means of summit and with the momentum of anti-hegemonism and anti-colonialism. Based on "the Five Principles of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Arab and African Countries", "Partnership diplomacy"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and African countries. It has already become the major means for China to make use of external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By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s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Developing Relations with Arab and African Count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new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new partnership with those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a's Diplomacy; African Arab Countries; Partnership Diplomacy; New Partnership;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责任编辑: 李 意)